

产业与消费“双升级”畅通经济双循环的影响机制研究

龙少波 张梦雪 田浩

摘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已成为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然而,当前我国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关键环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主要方面尚存在一些堵点,不利于双循环新格局的加快形成。产业与消费“双升级”对畅通经济双循环有着重要的作用。产业与消费“双升级”通过供给质量提升、技术进步方式转换、就业增加扩容三大机制能有效地疏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关键环节的主要堵点,并进一步通过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同作用,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同时,国内经济大循环畅通的过程又将助力于疏通国际经济循环的主要方面所存在的堵点,使得我国以更高的规模经济效能、产业层级和更强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协作,并反哺带动国内经济大循环,加快二者相互促进,最终形成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关键词:双升级;双循环;产业升级;消费升级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1)02-0090-16

改革开放以来,基于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我国大力实施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推动了经济的迅猛发展。然而,近年来,我国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革,国际经济大循环为主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一方面,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各国经济复苏乏力,逆全球化浪潮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致使我国外需疲软,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凸显;另一方面,国内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逐步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各种周期性、结构性、机制性问题相互交织,阻碍着国内经济大循

环畅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加快实现。现阶段国内与国际经济循环的关键环节和主要方面还存在一些堵点,制约着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加快形成。

201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经济政策要形成合力以促进产业与消费“双升级”,充分挖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与消费“双升级”成为进一步畅通经济循环的需要。产品生产作为产品供给端,代表着经济循环的开始;而消费作为需求端,则代表着经济循环的最终目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消费和产业‘双升级’协同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及政策研究”(20BJL03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政府治理和公共政策研究”(2019CDSKXYGG004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中国大宗商品价格‘超调’与货币政策规则研究”(2017CDJSK01XK13)。

作者简介:龙少波,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经济系副主任、副教授,重庆大学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张梦雪,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田浩,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的,也影响着下一轮经济再循环的开始。因此,产业和消费形成良性的闭合回路所带来的产业与消费“双升级”,势必会对经济循环的各个环节产生重要影响。目前,我国的产业与消费“双升级”趋势较为明显。一方面,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由2000年的14.7%下降至2019年的7.1%,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39.8%上升至2019年的53.9%,且各产业的内部结构不断优化,推动居民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另一方面,居民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并逐步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转变。总的来看,当前我国的产业升级推动着消费升级,而消费升级诱导着产业升级,二者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态势较为明显,但仍存在一些缺陷。而产业生产与消费又是国内经济循环最为关键的两个环节,两者升级会对经济双循环产生重要影响。

一、产业与消费“双升级”和经济双循环的内涵界定

产业与消费“双升级”和经济双循环各有其内涵,正确理解和把握其具体内涵是厘清产业与消费“双升级”畅通经济循环作用机制的基础。

(一)产业与消费“双升级”的内涵界定

学术界就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的概念已基本达成共识。具体来看,产业升级主要是指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包括产业间的协调发展,以及产业结构随着经济发展从低级向高级演进,即从第一产业占优向第二、第三产业占优转变^[1]。在此过程中,产业从低附加值、低技术水平、低加工深度、低规模经济状况,向高附加值、高技术水平、高加工深度、高规模经济状况演变^[2]。消费升级则主要是指消费总量的扩张与消费结构的升级^[3]。其中,消费总量扩张是指消费总体规模的不断增长,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断提升;消费结构升级则是指居民消费需求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转变,并呈现个性

化、多样化等特征^[4]。

然而,已有研究主要从单方面各自定义了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的内涵,并未对产业与消费的“双升级”内涵进行阐释。事实上,在产业生产与居民消费的良性互动过程中,产业升级带来的高质量产品与服务供给将创造和引领居民新的消费需求,促进消费总量扩张和消费结构优化^[5]。同时,产业升级过程伴随着资源配置优化和生产效率提高,将带动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提升,进而促进居民消费规模扩张与消费结构优化^[6]。消费升级所带来的市场需求规模和结构变动又将影响厂商的生产决策,最终引起产业升级^[7]。可见,产业升级是消费升级的物质基础,而消费升级是产业升级的内在动力。因此,产业与消费“双升级”的内涵可以定义为,产业升级通过创造引领、收入水平提升拉动消费升级,消费升级通过需求规模与结构变动诱导影响产业升级,从而形成的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协同促进、良性互动的过程。

(二)经济双循环的内涵界定

大量研究从不同视角出发,对国内和国际经济循环、经济双循环的内涵进行了解读。陆岷峰、周军煜认为,国内经济大循环包含两大要义:一是经济发展的范围在国内,二是经济发力的重点在内需^[8]。徐奇渊指出,作为供给侧改革的一种延续,经济双循环已不再是简单的供求关系,而是涵盖经济生产、交易、分配、消费等一系列环节^[9]。付万军指出,双循环就是要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其中,国内经济大循环的重点在于充分挖掘本国超大规模市场和释放内需潜力,而国际经济循环则意味着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发挥本国比较优势并形成规模经济效益^[10]。周跃辉提出,国内经济循环主要包括商品和要素、资金的循环,其过程涵盖生产、交换、分配和流通四个环节;国际经济循环则主要指商品、要素和外汇流入及流出本国的过程;经济双循环在于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

的互动互促与融合发展^[11]。吕秀彬认为,双循环是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中心和出发点,依托国内超大市场优势,促进生产、交换、分配、流通循环,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参与国际贸易分工与协作,推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双向联通^[12]。

综上,已有文献关于国内与国际经济循环和经济双循环内涵的研究较为丰硕,对国内经济大循环的认识基本达成了一致。但对国际经济循环的解读还较为笼统,并未详细阐述其具体的内容,也未体现国内与国际经济循环如何良性互动。有鉴于此,在已有文献的研究基础上,可以将经济双循环界定为: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以国内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产品与要素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个环节在国内的良性往复循环;同时,在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基础上,推动产品与服务、技术、资金更好地在国内与国际市场之间流动,使得本国以更高的规模经济效能、产业层级和更强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协作,并进一步反哺和带动国内经济大循环,从而形成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互动互促的经济发展新格局。

二、当前我国经济双循环关键环节与主要方面的堵点及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的前三十多年,基于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我国实施的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是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然而,随着内外部环境的转变,这种“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弊端亦逐渐显现,使得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关键环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主要方面出现堵点,不利于二者的畅通运行、互相促进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一)国内经济大循环关键环节存在的堵点及其表现

国内经济大循环主要是指产品和要素的生

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个环节的有效对接与周转,这是对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其中,生产是循环的起点与物质基础,分配和流通是连接贯通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桥梁,消费是社会生产的终点也是新一轮再生产的起点。可见,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是“循环”,需打通国内经济循环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关键环节的堵点^[13]。事实上,当前我国在这四个环节中均存在一些堵点,不利于国内经济大循环的畅通运行。

1.生产环节存在的堵点及其表现

影响产业生产供给质量的因素一般包括技术投入、产出产品与服务以及对产业生产组织方式和生产效率起重要作用的政策制度供给环境等。现阶段,我国生产环节在这些方面还存在如下堵点:

在产业生产的技术投入方面,存在部分高端、关键、核心技术短缺所带来的“卡脖子”问题。在前期以国际经济大循环为主的对外开放中,通过开放国内市场,可以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和购进先进的机器设备。以引进式模仿创新为主的技术进步成为我国提高技术水平的主要方式,并促进了我国生产技术的明显提升。但在这种模式下,先发国家对后发国家所采取的最优技术输出策略是保留最前沿的关键核心技术,仅输出该国已较为成熟的中高端技术。而对后发国家而言,由于原发式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方式周期长、风险大、见效慢,为了追求高利润和经济高速增长,厂商和地方政府均缺乏内在激励去开展关键核心技术自主研发,而更加倾向于采取周期短、风险小、见效快的引进式模仿创新技术进步方式。这导致了我国的部分产业对引进先发国家的技术形成了所谓的“路径依赖”,其自主创新意愿不足,并带来了在关键技术、基础元器件上被“卡脖子”的困境。高端、关键、核心的技术供给严重短缺,致使我国部分生产领域的产业链与供应链在关键元器件、核心零部件的供给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高端产业技术要素的自我供给

基础较为薄弱,产业链技术现代化水平不高。

在生产端的产品与服务供给方面,供给质量不高、结构性短缺的问题较为突出。在出口导向为主的国际经济大循环中,作为后发国家,借鉴先发国家工业化发展经验,引进国外生产线进行批量生产,成为产业发展的占优选择^[14]。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各地方政府和厂商容易同时看好并引进同类产业,带来产业投资的“潮涌现象”^[15],造成所生产的产品与服务的同质化。我国从发达国家引进和承接的大多是相对本国较为先进、但相对国外属于中端的资源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的同质化发展叠加关键核心技术要素的短缺,导致我国生产端整体供给层次相对不高、结构性短缺问题突出,并难以有效满足消费环节居民日益增长的中高端产品与服务需求,致使国内消费需求外溢,形成了“结构性短缺→消费升级→消费外流→产业升级缺乏动力”的不良后果^[16]。生产端供给质量层次不高所带来的供需结构性错配问题,不利于国内经济畅通循环。

在生产端的政策制度供给方面,营商环境改善等有利于供给优化的政策制度需进一步加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优化营商环境一直被列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目前民营企业所面临的营商环境仍然有待改善。其一,电信、金融、矿产资源开采等领域,在设立主体、出资规模、软硬件标准等方面的政策门槛仍然较高,隐性壁垒较多,民间资本进入依然较为困难,致使相关行业缺乏有效竞争而有效供给不足。其二,民营、小微企业融资相对困难。不同于大型国有企业,民营、小微企业的资产质押品少,信用资质较低,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使银行产生“惜贷”情况,进而造成民营、小微企业融资困难。其三,产权保护体系尚不健全。产权主体权责界限的划分较为模糊,致使处于生产端的企业自主创新动力不足,不利于产品创新与技术扩散。其四,民营企业生产税费成本依

旧较高。相对于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的投资主体多为私人资本,其在缴纳企业所得税以后,投资者税后分配的股息、红利还需缴纳个人所得税^[17],税收负担偏重,不利于其扩大投资并促进产业升级。

2. 分配环节存在的堵点及其表现

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构成了收入分配的主要内容。分配环节对于效率与公平兼顾的程度将直接影响消费环节居民的消费能力,进而影响居民有效消费需求的释放。现阶段,我国分配环节还存在如下堵点:

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偏低。在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国际经济大循环下,我国凭借廉价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接收国外发包并进行代工和加工生产,制造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而研发设计、市场销售等大量高额利润环节被国外资本所垄断,微薄的利润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制造业部门劳动力工资的上涨。并且,前期我国的技术进步主要以引进式模仿创新为主,技术主要蕴含于所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与所购进的先进设备投资之中,这种强烈的资本偏向性特征使得资本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相对较高并能获得较高的回报^[18]。因此,初次分配过程中,在引进式模仿创新的技术进步方式下,强烈的资本偏向性使得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受到挤压^[19]。事实上,1999—2009年,外资利用、设备工器具购置增速及所引发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等代表引进式模仿创新的技术进步的指标总体均呈上升态势。与此相对应的是,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却出现下滑,尽管其随后有所回升并于2017年达到47.51%,但仍低于1999年52.38%的水平。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53.34%的水平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前期的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及其带来的引进式模仿创新为主的技术进步方式,致使我国初次分配不均衡、劳动报酬占比偏低,并进一步带来消费环节居民消费能力

不足等问题,不利于壮大国内需求与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

在再分配中,相应政策对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减轻作用仍然相对有限。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我国物质资本存量相对匮乏,为了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国家依靠强控制力的优势采取非平衡增长战略,通过对有限的资源进行统筹调配,结合税收补贴和金融等优惠政策,为具有地缘优势的城市地区、东部地区、工业行业的优先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20]。然而,这种不平衡的发展战略在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使得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出现两极分化并衍生出收入差距问题。与之对应的是,国家税收和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政策的作用力度却相对较小,不能抵消优先发展战略的影响,最终导致城乡、区域、行业与群体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3.流通环节存在的堵点及其表现

一般而言,流通环节主要包括商品流通与要素流通。商品与要素流通顺畅与否直接影响着生产环节与消费环节的对接与畅通好坏。现阶段,我国商品和要素的流通环节存在如下堵点有待疏通:

就商品流通方面而言,存在物流成本偏高、农村物流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问题。一方面,我国商品流通成本仍然偏高,尽管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重已从1991年23.7%的峰值降至2019年的14.7%,但与发达国家6.5%左右的平均水平相比,可压缩的空间仍然较大^[21];另一方面,城乡之间流通基础设施供给不均衡明显,农村地区物流条件受限。与城镇地区相比,受经济发展水平、地形地貌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村地区道路、交通枢纽、配送网点相对不足,大部分物流配送网点只设置到乡镇一级,“最后一公里”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此外,由于投入不足,农村交通网络普遍存在年久失修、老化等问题,致使商品的便捷流通受阻,并阻碍了生产环节与消费

环节的有效对接,进而制约了国内经济大循环畅通。

就要素流通方面而言,诸多隐性成本的存在致使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受限。受地理区位和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不同地区生产要素的存量和增量差异较大,因而要素自由流动互补对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畅通循环尤为重要。但受过去长期实施的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影响,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等的发展出现分化^[20]。东部地区、城市地区经济发达,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其能给生产要素带来相对较高的回报,因而要素流动整体呈现从西部到东部、从乡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部分地方官员为谋求经济短期快速增长进而获得较大升迁机会,人为地设置各种行政与区域壁垒,以保护地方产业的发展。由此带来的隐性成本导致我国要素市场分割且要素自由流动受限,并制约了生产环节的有效开展,从而不利于国内经济的良性循环。

4.消费环节存在的堵点及其表现

有效消费需求的形成要求消费者必须同时具备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并且不同群体之间消费能力差距不能过大,否则会直接影响总体消费规模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并引致消费环节的堵点。目前,我国国内经济大循环消费环节存在的主要堵点如下:

第一,居民消费能力有待提升。就总体消费能力而言,分配环节存在的劳资分配不合理问题,使得我国人均收入水平依旧相对较低。按可比价格计算,2019年居民收入水平仅为同期美国的1/4。从消费能力分布来看,高收入群体与中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导致二者消费能力差距过大。而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普遍偏低,中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高。高收入群体与中低收入群体之间消费能力差距过大,导致消费分层与消费不平等现象明显,中低收入群体因消费能力不足而部分潜在消费需求

无法得到释放,制约了我国消费结构优化升级。此外,近年来我国房价上涨较快,房价收入比过高致使居民部门杠杆率攀升,并挤出了部分其他消费需求。尽管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不断增长并在2019年已经超过40万亿元,但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不足40%,与美国等发达国家60%以上的水平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①。

第二,居民消费意愿不足。一方面,公共消费率偏低挤压居民消费支出。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消费不足,使得居民个人消费存在后顾之忧。据WDI数据显示,1970—2018年,我国公共消费率仅维持在10.96%~16.84%的水平,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并且,从公共消费的内部结构来看,过高的政府自身行政消费挤压了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性消费支出。公共消费率偏低导致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提升,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而消费意愿不足。另一方面,消费环境欠佳阻碍了居民消费意愿提升。部分不法厂商受利益驱动,利用自身与消费者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以次充好,销售虚假劣质产品。而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又尚未健全,导致现有法律体系下的消费者维权困难、维权成本偏高。由此所带来的消费环境欠佳,致使居民消费意愿不足,从而不利于居民潜在消费需求的释放,并进一步制约了生产环节的有效扩张与国内经济的循环畅通。

(二)国际经济循环主要方面存在的堵点及其表现

已有研究并未对国际经济循环进行明确界定,但从一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基本内容来看,主要包括产品与服务、技术、资金三个方面。因此,国际经济循环可以定义为一国通过产品与服务、技术和资金在本国与国际市场之间的流通,参与国际分工和协作的过程。与国内经济循环相似,之前的出口导向为主的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已难以适应现阶段我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变化,

各种堵点日益凸显,阻碍了国际经济循环的畅通运行。

1.产品与服务循环方面存在的堵点及其表现
就产品与服务的国际循环而言,主要包括产品与服务的出口与进口。目前,我国产品与服务的国际循环还存在如下堵点:

一方面,产品与服务的出口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我国的出口仍以低附加值产品与服务为主。在出口导向为主的国际经济大循环中,我国生产部门主要是凭借低成本劳动力优势融入国际分工格局,接收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发达国家的发包,而在低利润环节进行代工生产,且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受制于发达国家,导致我国出口产业层级较低,低附加值的产品加工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占比高达1/4^[22],出口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第二,多重不利因素的叠加致使产品与服务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弱化,主要体现在:其一,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老龄化趋势日益加重,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基于大规模廉价劳动力而形成的产品低价优势逐渐弱化,出口竞争力下滑。其二,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各国经济复苏乏力,逆全球化浪潮、地缘政治日益兴起,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导致我国外需疲软,外需对经济增长贡献下降。2008年以来,我国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由2006年35.36%的峰值不断下滑至2019年的17.39%。可见,当前产品与服务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经趋于弱化,在我国经济体量不断变大的情况下,依靠出口需求畅通大国经济循环的外部条件已不复存在。

另一方面,产品进口亦存在依赖度过高的问题。从最终消费品来看,我国对部分高附加值的中高端消费品进口依赖程度仍然偏高。国内生产环节存在的高端供给结构性短缺问题,导致居民中高端消费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而只能依赖

^①2018年,美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高达64.98%,数据来源于WDI数据库,经作者计算得到。

于进口。2018年在我国售卖的国际精品品牌产品销售总额高达2503亿元。从生产投入品来看,部分关系到国家战略性安全的大宗商品对外依存度过高。当前,我国所需要的全部大宗商品种类中的60%依靠进口^[22],其中原油、铁矿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了76%、85%。作为重要的工农业生产主要投入品,大宗商品进口依存度较高使得本国生产易受到外部冲击,降低了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导致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外部风险较高。

2. 技术循环方面存在的堵点及其表现

一般而言,技术的引进与对外扩散构成了技术国际循环的主要内容。目前,我国技术引进和对外扩散方面还存在如下堵点有待疏通:

一方面,技术引进空间受限,关键核心技术的引进壁垒过高。经过数十年的对外开放,国内生产环节中以引进式模仿创新为主的技术进步方式,使得我国逐渐缩小了与先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部分技术已经达到先发达国家前沿,技术引进空间受限。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出于维护自身国际地位和垄断利益的需要,先发达国家对关键核心技术的对华输出设置了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致使我国难以通过技术引进获取关键核心技术。国际前沿技术输入空间的缩窄,不利于国际经济循环中的技术交流与扩散,也不利于促进国内技术进步与国内经济循环畅通。

另一方面,在技术扩散中,我国对外技术投资的空间受到挤压。除特定的几个领域外,我国当前的总体技术水平较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自主研发的和拥有国际专利认证的先进技术较少,当以技术入股形式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就会面临来自其他发达国家的激烈竞标竞争并处于劣势,这不利于我国在海外技术溢出、市场的开拓以及国家影响力的快速提升。

3. 资金循环方面存在的堵点及其表现

就资金的国际循环而言,主要包括资金的输出和输入。当前,我国资金的国际循环还存在如

下堵点:

就资金的输出而言,积累的外汇储备未得到有效配置。廉价劳动力资源形成的出口竞争优势和外资的不断涌入,使得我国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形成“双顺差”并积累了大额的外汇储备。然而,我国外汇储备的结构仍然不够优化,美国的国债配置仍占据了较大比重。这种相对单一的债权结构不仅收益率偏低,而且存在较高的贬值风险,导致我国巨额外汇资产未得到有效配置。因此,未来如何将巨额的外汇储备形成有效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畅通国际经济循环的重要方面。

就资金的输入而言,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深度与广度有待进一步提升。近年来,我国深入推进QFII/R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改革,逐步扩大了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力度。然而,随着我国经济体量与质量不断提升,外资进入我国金融领域的需求也日益增加,但考虑到金融风险防范问题,我国金融开放的广度与深度仍然相对不足,不仅无法满足外部需求,而且由于本国金融企业长期受到过多保护,缺乏来自国际金融机构的业务竞争,不利于提升其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水平,从而不利于国内经济循环。

三、产业与消费“双升级”畅通经济双循环的机制

上述分析表明,现阶段我国在国内经济大循环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关键环节,以及国际经济循环中的产品与服务、技术、资金的流通等主要方面均存在堵点,制约了两个循环的各自畅通运行和二者之间的相互促进,不利于我国加快“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与此同时,当前我国产业与消费“双升级”态势明显,如果我们继续加快“双升级”,就能通过供给质量提升、技术进步方式转换、就业增加扩容三大机制疏通当前国内经济大循环中关键环节的主要堵点,并进一步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作用下畅通国内经济

大循环。而国内经济大循环逐渐畅通所带来的新的比较优势又有助于疏通国际经济循环中的堵点,使得本国以更大的规模经济效能、更高的产业层级、更强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协作,并进一步反哺国内经济大循环,从而加速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互动互促,加快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见图1)。

(一)产业与消费“双升级”助力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

1.产业与消费“双升级”通过供给质量提升机制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

产业与消费“双升级”通过供给质量提升机制,在“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创造引领”和“收入提升”效应的共同作用下,疏通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的堵点,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畅通。

一是“产业供给结构优化”效应。产业升级带来的产品与服务供给质量的提升,直接优化生产

环节的产出供给结构,缓解当前生产环节“产能过剩”与“供给缺口”并存的问题,疏通生产环节的堵点。即:产业升级→产品与服务供给结构优化→疏通生产环节堵点。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生产要素结构、生产组织方式的逐渐合理化和优化,在带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带来了供给结构的优化。这种产业供给端结构的持续优化,将直接促进产品与服务供给质量提升,并通过产业的上下游关联作用增加整个产业链条的中高端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疏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在生产环节的供给结构性短缺的堵点。

二是“创造引领”和“收入提升”效应。供给质量提升机制通过“创造引领”效应和“收入提升”效应促进居民消费升级,形成产业与消费的“双升级”互动并疏通消费环节的堵点。即:产业升级→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提升→创造引领和收入提升→消费升级→疏通消费环节堵点。具体表现为:一方面,生产环节的高质量产品与服务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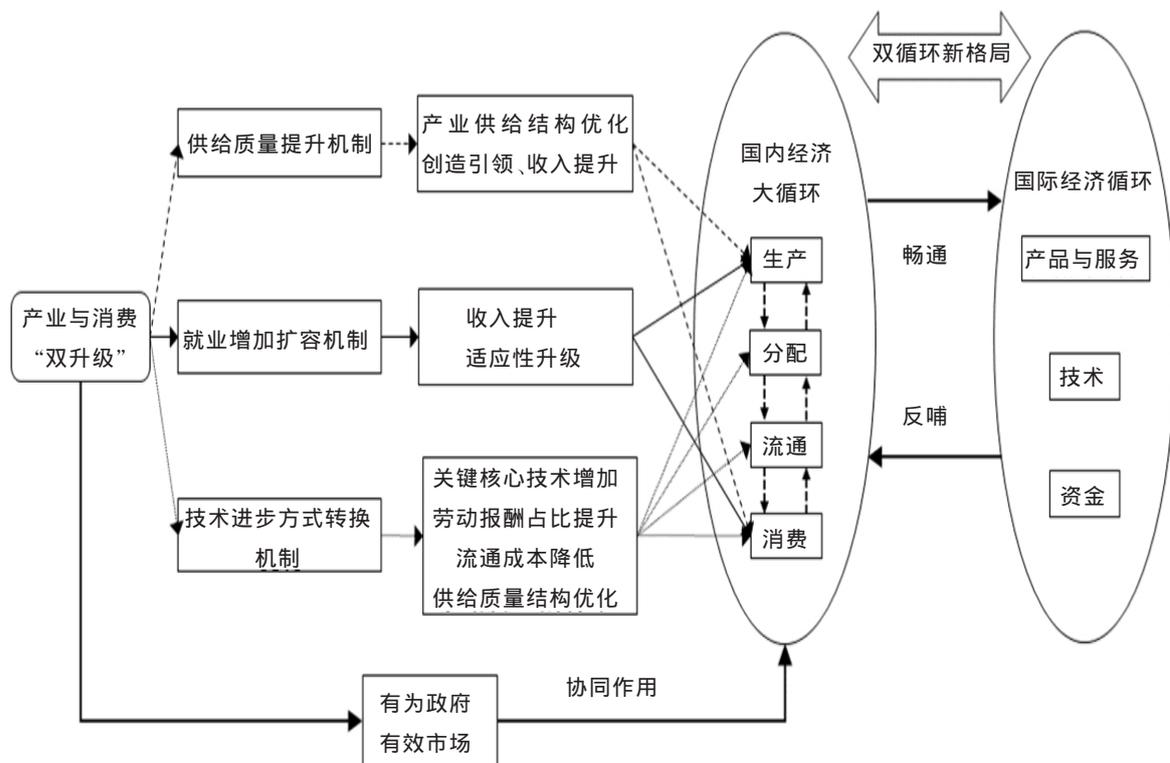


图1 产业与消费“双升级”畅通经济双循环的作用机制

的增加通过来自供给端的“创造引领”效应,激发和引致居民形成新的消费需求并提升其消费意愿,带来居民消费升级。产品与服务供给质量提升所带来的新产品、新服务、新品牌与新时尚等能激发和引领更多的新兴消费^[6]。另一方面,产品与服务质量的提升使得产业链中各环节中的产品与服务从低端向高端演化^[23],将大大提高产品附加值并促进产业的利润增加,从而带来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24]。而居民收入水平增加将促进居民消费能力提升,通过推动居民预算线外移与旋转,带动消费总量扩张与消费结构优化升级,从而实现消费环节的消费升级,疏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在消费环节的堵点。

因此,产业与消费“双升级”的良性互动通过供给质量提升机制所带来的高质量产品与服务供给的增加,不仅能直接疏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在生产环节的高质量供给结构性短缺堵点,而且能解决消费环节居民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不足等堵点,有助于在生产与消费两个环节实现有效匹配与对接,从而有利于国内经济大循环的畅通。

2. 产业与消费“双升级”通过就业增加扩容机制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

产业与消费“双升级”通过就业增加扩容机制,能带来就业渠道与就业机会增加,提高社会对劳动就业的吸纳能力,在“收入提升”和“适应性升级”两大效应的共同作用下,疏通国内经济大循环中消费与生产环节存在的部分堵点。

在产业和消费“双升级”的过程中,产业和消费的升级各自都会带来就业的增加扩容。其一,产业升级会带来劳动就业机会的增加^[25]。产业升级的一大重要体现是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占优向第二、三产业占优演变^[26]。从就业功能来看,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远远强于工业部门,1单位的服务业增加值所创造的工作岗位约为工业部门的1.5~2倍^[27]。2000—2019年,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态势明显,第二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从45.5%下滑至39%,而第三产业增加值在

GDP中的占比则从39.8%增长至53.9%,单位GDP吸收就业的能力随之增强。如近年来兴起的快递、外卖等服务行业,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从而提供了许多新的就业岗位,扩大了全社会的劳动就业吸纳能力。其二,消费升级带来了劳动就业岗位需求的增加。在当前社会快速发展与变迁的背景下,消费者追求快速、便捷的消费模式以及更加注重精神需求的消费偏好和习惯的转变,诱导并催生了许多新业态、新模式,进一步促进了相应的就业渠道与就业机会的增加。特别是疫情之后场景化的直播带货,以抖音、快手等为代表的平台经济,以及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数字经济,其不仅就业带动能力强且覆盖面极为广阔,从城市到农村,各行各业的群体大都能依托这些新业态、新模式多渠道地参与社会分工与就业,带来了全社会中的正式和兼职就业岗位的增加扩容。

产业与消费“双升级”的就业增加扩容机制,能通过“收入提升”和“适应性升级”两大效应分别疏通消费环节和生产环节的堵点,从而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的畅通。

一是“收入提升”效应。就业增加扩容机制通过“收入提升”效应带来消费升级,疏通消费环节堵点。即:就业增加扩容→收入提升→消费升级→疏通消费环节堵点。新增就业岗位带来新增就业人群的收入增长和消费能力提升,并使其消费规模较之前出现扩张。与此同时,收入增长还能带来该部分群体消费结构的优化。因此,就业新增扩容带来的“收入提升”效应会从消费规模和消费结构优化两大方面带来消费升级,并同时缩小社会消费差距、降低消费不平等、削弱消费分层等现象,有利于疏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在消费环节的堵点。

二是“适应性升级”效应。就业增加扩容机制通过“适应性升级”效应诱导产业再升级,疏通生产环节堵点。即:就业增加扩容→消费升级→产

业适应性升级→疏通生产环节堵点。上述就业增加扩容所带来的消费升级,使得消费者对产品与服务的要求也不断提高,而这种来自需求的结构变动通过市场机制向生产者传递信号,诱导企业改变生产决策,促使其提升生产端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质量以使之与需求变换相适应,从而实现产业的“适应性升级”^[28]。一般而言,随着就业增加扩容和收入水平提升,需求收入弹性高的产品需求比重不断提高,其相应行业在产业结构中的占比也动态提高,表现出适应性产业升级特征。可见,由就业增加扩容以消费升级为中间渠道,会形成反馈效应并再次作用于产业升级而形成循环回路,间接疏通生产环节的堵点,助力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

综上,产业与消费“双升级”带来的第三产业扩张和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壮大,为广大社会成员开辟了多元化的新型就业渠道与就业机会,全社会劳动就业吸纳能力得到较大提升。在就业增加扩容机制下,居民(特别是广大中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增加,通过“收入提升”效应激发其潜在消费需求并优化其消费结构,进而打通国内经济大循环中消费环节存在的居民消费能力不足导致的消费需求不足堵点,充分激发内需潜力并促成国内强大市场的形成。而国内强大市场的形成又能通过“适应性升级”效应进一步带动生产环节的有效扩张和再升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助力国内经济大循环畅通。

3. 产业与消费“双升级”通过技术进步方式转换机制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

产业与消费“双升级”通过技术进步方式转换机制,能有效促进我国技术进步方式从引进式模仿创新为主向原发式自主创新为主转变,从而有利于疏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环节的堵点。

在产业与消费“双升级”互动过程中,时刻伴随或带来技术的不断进步,产业与消费“双升级”

互动与技术进步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

在产业升级的驱动因素中,技术进步是根本途径和直接动力^[29],无论是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还是新兴产业的涌现与发展壮大,都离不开技术进步的驱动。一方面,当传统产业遭遇瓶颈或触及“天花板”时,技术水平的提升将促进其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变革,推动其转型升级。并且,技术进步还具备强大的“扩散效应”与“连锁效应”^[30],在横向扩散过程中,单个企业的技术进步将引发同行业其他企业的竞相模仿,从而带动整个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另一方面,新兴技术通过逐步的工程化,本身就能形成一种新兴产业,并关联一系列上下游新兴产业的兴起,从而带动产业升级。因此,产业升级本就伴随着技术进步。

在消费升级过程中,居民对中高端消费品的需求偏好增加又能通过需求导向和库兹涅茨产业资源转移效应倒逼产业技术进步^[31]。消费升级意味着消费者需求偏好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商品向个性化、品质化、享受化的商品转移。这种需求偏好的转变,一方面直接通过需求导向引导生产者加快技术改良;另一方面又能通过触发库兹涅茨产业资源转移效应,促进生产部门技术要素与科技资本从低端供给部门向中高端供给部门流动,实现重组优化,从而引发技术变革。因此,消费升级亦能引致技术进步。

与之对应的是,当技术进步的方式发生转变时,也会作用于产业与消费“双升级”,并影响到国内经济大循环。随着我国与国际技术前沿面的差距缩小,我国引进式模仿创新的技术进步方式空间已经大幅收窄,且近年来西方国家加大了对我国的技术封锁。因此,现阶段我国产业与消费“双升级”带来的技术进步主要以原发式自主创新为主,而引进式模仿创新技术进步的占比将会大幅缩小。我国技术进步方式从引进式模仿创新为主向原发式自主创新为主转变,对于国内经济大循环各环节的畅通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生产环节,产业与消费“双升级”互动通过技术进步方式转变机制,促进我国技术进步方式从引进式模仿创新为主向原发式自主创新为主转变,能有效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增加中高端、关键、核心技术供给,解决生产环节技术投入在部分中高端、关键领域的“卡脖子”问题,促进产业升级,助力疏通生产环节堵点。

在分配环节,产业与消费“双升级”通过技术进步方式转变机制,能改变以往引进式模仿创新为主的技术进步方式下资本报酬挤占劳动报酬的局面。与具有强烈资本偏向性的引进式模仿创新为主的技术进步方式相比,在原发式自主创新为主的技术进步方式下,从技术研发到产出再到应用,高素质劳动力是关键投入要素。因此,原发式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方式对人力资本要求较高,在劳资分配方面更具劳动偏向性^[19]。相应地,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高需求决定了相对较高的劳动报酬。这种较强的劳动偏向性将带动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的提升,从而促进劳资分配合理化,从分配失衡转向共同富裕,助力疏通分配环节的堵点。

在流通环节,产业与消费“双升级”互动通过技术进步方式转变机制,能催生大量现代信息技术与数字技术的自主研发与应用,提升我国流通领域科技水平,并促进商品流通环节的路线设计与选择以及流通方式等实现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推进信息共享与有效对接,降低物流成本并提升物流效率,助力疏通流通环节堵点。

在消费环节,技术进步转换机制带来的上述更为合理的劳资分配格局,将使得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从而带动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并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同时,当前我国自主研发并领先的大数据、云计算、5G等新技术的深度应用,也将带来供给质量提升和个性化消费升级,助力疏通消费环节堵点。

因此,产业与消费“双升级”通过技术进步方式转换机制,有助于疏通生产环节关键核心技术

“卡脖子”堵点并提升产出供给层次,从而更好地满足消费环节的中高端居民消费需求;而流通环节物流成本的降低与效率的提升将更好地连接贯通生产与消费;分配环节劳动报酬占比的提高又将促进消费环节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并带动生产环节进一步有效扩张,从而助力国内经济大循环畅通。

4.产业与消费“双升级”通过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作用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

通过上述三大机制,产业与消费“双升级”能有效疏通国内经济大循环中各环节存在的主要堵点,但仍有部分堵点需要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协同作用,在共同发力促进产业与消费“双升级”的过程中加以解决。因为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体制机制改革,改革的重点又在于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13]。马克思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产业与消费“双升级”所引发的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变,需要政府进行相应的体制机制变革,以充分发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同作用,这样方能疏通上述三大机制本身难以解决的堵点,从而更好地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总体来看,政府与市场通过协同作用以促进产业与消费“双升级”,从而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内容主要包括两大方面:

一方面,产业升级离不开与之配套的良好营商环境支撑^[9],这就要求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发力。具体来看,首先需要有为政府破除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包括逐步放开部分产业和生产领域的进入壁垒,改革并健全金融服务体系与税收制度,提高民营小微企业的融资能力并减轻其税赋负担,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和行政区域壁垒,促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强产权保护。当有为政府破除一系列体制机制障碍以后,有效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才能得以发挥,不同市场主体依据市场规则与市场价格获取生产要素的机会逐渐平等,从而助力各种所有制企业进行充分有序的市场竞争,这种有序的竞争又将驱动产业

内部与产业之间进行“良币驱逐劣币”的转换,最终实现产业内部与产业之间的结构优化与升级。

另一方面,消费升级要求广大居民具备充足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这也需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发力。就政府而言,需要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政策,降低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以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并且对房价进行合理调控以释放居民的消费需求^[13]。同时,还要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增加公共消费支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农村物流基础设施以增强消费的便捷性,从而达到增强居民消费意愿的目的。与此同时,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在要素定价机制方面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土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报酬合理化,并带动居民收入来源多元化与收入水平提升,从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并激发居民消费潜力。

因此,产业与消费“双升级”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作用下,有利于弥补三大机制的不足,疏通国内经济大循环中生产环节营商环境不佳、流通环节物流基础设施不完善与要素自由流动受限、分配环节再分配不均、消费环节居民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不足等堵点,进而促进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大环节实现良性对接,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畅通。

(二)国内经济大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形成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随着国内经济大循环的逐渐畅通,我国将形成新的、更强的比较优势,并助力疏通国际经济循环中的堵点,促进产品与服务、技术、资金在国内与国际市场之间更好地流动,使得本国以更大的规模经济效能、更高的产业层级、更强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协作,并进一步反哺国内经济循环,从而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1.国内经济大循环助力畅通国际循环

随着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大环节逐渐有效匹配与对接,国内经济大循环逐渐畅通,我国

将逐步形成高质量产品与服务优势、高新技术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这些新的比较优势将改变我国过去“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经济大循环的经济发展格局,疏通产品与服务、技术、资金在国内与国际市场流通存在的堵点,从而助力畅通国际经济循环。

第一,高质量产品与服务优势助力畅通国际经济循环中产品与服务进出口方面的堵点。从产品与服务来看,随着国内经济循环的畅通,生产端的各产业部门供给将逐步形成高质量产品与服务优势。一方面,相对于过去廉价劳动力形成的出口产品低价优势而言,出口部门的高质量产品与服务优势是一种更为持续、更具核心竞争力的优势,其不仅能带来更高的附加值,而且不易受原材料价格变化、汇率波动、贸易壁垒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因此,国内经济大循环逐渐畅通带来的高质量产品与服务优势将带动出口部门产品附加值提升,促进本国出口结构优化。另一方面,国内企业高质量产品与服务优势的形成,又能增加国内中高端最终产品与服务供给,满足居民对中高端消费品的需求,降低当前的进口依赖程度。

第二,高新技术优势助力畅通国际经济循环中技术引进受限、对外技术投资受挤压、生产投入品进口依存度较高等堵点。随着国内经济循环逐渐畅通,我国技术创新能力将不断提升,在关键、核心领域攻关成功带来的高新技术优势,将强化本国技术进步自主权,打破技术引进方面存在的引进空间受限以及先发国家的高技术输出壁垒等,并形成我国在发展中国家以技术入股形式的海外直接投资竞争优势,进一步推动我国产业形成以技术为核心竞争力参与国际分工与协作的能力,使得我国以更高的产业层级融入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实现“三链”地位的提升。此外,能源开采等方面的自主创新技术的应用还能提高生产环节中资源的利用和配置效率,提高能源开采的可行性、安全性与经

济效益,促进新能源的开发,降低本国对石油、铁矿等重要生产投入品的对外依赖度,从而提高本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性。

第三,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助力畅通国际经济循环中资金方面存在的堵点。随着国内经济循环的畅通,供求多元、创新活跃、拉动力强的超大市场规模优势逐渐形成,其内含的完备的产业链与供应链体系、巨大的需求吸附力与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活力与韧性更强,国民经济整体规模效能突出^[32],这将进一步促进资金在本国的流入与流出。一方面,从资金的流出来看,国内经济的稳步长足发展,势必会带动本国对外投资扩张,从而促进外汇储备投资渠道多元化和配置效率提高。另一方面,完备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与强大的内需市场意味着本国经济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增强,将使得本国政府更加有信心推进金融资本账户开放,利用外资带动本国金融业进一步发展壮大,从而提升其服务于本国实体经济的能力。

2. 国际经济循环反哺国内经济大循环

与之相对应的是,国际经济循环的畅通又能反哺国内经济大循环,进而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水平进一步提升。

第一,国际经济循环通过竞争压力效应反哺国内经济大循环。无论是本国的产品与服务出口到国际市场,还是本国从国际市场上进口产品与服务,理性的本国厂商为了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赢得较大的市场份额,从而获得较高的利润,势必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改进和提升产品质量、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以提升生产效率和降低生产成本等。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那些生产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不佳的本国厂商将逐渐被市场淘汰,而得以生存的往往是整体生产力、竞争力与发展潜力都相对较高的厂商。这样的良性循环往复将引起本国产业进一步升级扩张,带动我国产品与服务质量进一步提升,进而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

第二,国际经济循环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反哺国内经济大循环。技术引进不仅带来了技术本身,而且能对东道国产生溢出效应并带来正外部性。当一项新技术被引进国内时,可填补本国相关领域的技术空白,且本国厂商通过模仿、消化、吸收并将其本土化还能引致新技术的创新,从而推动本国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并为国内经济循环的畅通加码。

第三,国际经济循环通过资金优化配置效应反哺国内经济大循环。一方面,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资金能直接为本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其所需要的资本,进而推动国内经济大循环;另一方面,金融渠道流入的外资能通过促进本国金融企业提升对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服务效率,进而间接地服务于实体经济从而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

第四,国际经济循环通过倒逼国内经济政策制度改革创新反哺国内经济大循环。随着本国经济参与国际循环的程度日益深化,本国对外开放的内容将不再仅停留于产品与服务、技术、资金等层面,相应地还需要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因此,参与国际经济循环要求本国对标国际先进规则,进一步合理促进国内深化制度改革与创新,进而为深入融入全球价值链营造更良好的政策制度环境,而政策制度环境的改善又能进一步带动国内经济大循环畅通。

第五,在国内经济大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互动互促的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过去长期采取的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国际经济大循环发展战略难以为继。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新时代我国经

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然而,现阶段国内经济循环关键环节与国际经济循环主要方面均存在一些堵点,不利于我国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有鉴于此,本文从产业与消费“双升级”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双升级”通过供给质量提升、就业增加扩容和技术进步方式转换三大机制,并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作用下,促进国内经济循环畅通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国内经济大循环使得本国以更大的规模经济效能、更高的产业层级、更新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协作,形成对国际经济循环的带动作用,以及国际经济循环反哺国内经济大循环,最终形成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作用机制。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继续深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产业升级强化供给质量提升机制,助力加快构建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方面,坚持市场出清的定力和决心,大力去除无效、低端、过剩产能,综合运用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并结合政府专项整治行动,推进过剩行业的部分低效僵尸企业破产、倒闭、重组或退出,提升生产端产品与服务供给质量。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疏通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的政策障碍,合理增加符合市场需求导向且发展和盈利前景好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方面的有效投资,优化产业链与供应链水平,促进中高端产品供给增加,助力加快形成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第二,注重和加快实施需求侧改革,强化就业增加扩容机制,着力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助力加快形成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提升消费能力层面,政府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强化劳动力技能培训,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完善再分配制度,通过减税、增加转移支付等向中低收入群体的倾斜力度,提升其消费能力。对

于就业吸纳能力强的产业,特别是外卖、快递等产业,要适当加大对其扶持力度,从而充分发挥其社会就业吸纳能力。同时,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健全各类生产要素报酬由市场决定的机制,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尽可能稳定和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强化消费意愿方面,要积极发挥政府顶层设计作用,加快构建包括住房、教育、医疗、育儿、养老等领域在内的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加强产品质量监管,加强对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击力度,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最大程度地降低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第三,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有效市场培育与有为政府调控相结合,加强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技术进步转换机制,助力加快形成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技术创新是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为此,一方面,应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加快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促进高素质人力资本、高新技术报酬的合理化,从而为微观主体开展技术创新提供内在激励;另一方面,政府应综合运用产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政策激励并引导微观主体进行科技创新,加大投入强度,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制度保障,推动原发式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方式不断强化,助力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第四,加快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国内与国际经济循环相互促进,在国际开放与合作中加快形成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是适当降低关税水平,扩大对外贸易,加强本国与国际市场之间经贸合作,促进产品与服务更好地“走出去”与“引进来”;二是立足国情,积极有效利用外资,再次合理缩减负面清单,逐步渐进地放开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劳务市场,在把控风险的前提下把对外开放拓宽至能源、交通、金融、保险、房地产、

科技、教育等重要领域;三是借助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战略平台,加强国际间的产业合作,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并利用国际资源完成本土产业链的补链、扩链、强链;四是全面深化国际营商环境改革,对标国际一流标准,持续优化制度建设,保障各种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为产品与服务、技术、资金的国际流动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促进和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Reform**

参考文献

- [1] 苏东水.产业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34.
- [2] 刘志彪.产业升级的发展效应及其动因分析[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3-10.
- [3] 王云航,彭定赞.产业结构变迁和消费升级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121-129.
- [4] 尹世杰.充分发挥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J].经济纵横,2002(3):2-7.
- [5] 孙早,许薛璐.产业创新与消费升级: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的经验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8(7):98-116.
- [6] 龙少波,丁露,余康.中国式技术变迁下的产业与消费“双升级”互动机制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20(10):71-84.
- [7] CLARK C. The conditions economic progress [J]. Population (French Edition), 1960, 15(2): 374.
- [8] 陆岷峰,周军煜.数字货币背景下商业银行业务未来发展前景、变革与重构[J].西南金融,2020(9):3-13.
- [9] 徐奇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如何理解和构建[J].金融论坛,2020(9):3-9.
- [10] 付万军.建国内国际双循环 塑经济发展新格局[J].中国金融家,2020(7):62-65.
- [11] 周跃辉.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 [N].成都日报,2020-08-26(006).
- [12] 吕秀彬.“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探析 [J].新经济,2020(10):46-50.
- [13] 王一鸣.百年大变局、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J].管理世界,2020(12):1-13.
- [14] 林毅夫,张鹏飞.后发优势、技术引进和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J].经济学(季刊),2005(4):53-74.
- [15] 林毅夫.潮涌现象与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理论的重新构建[J].经济研究,2007(1):126-131.
- [16] 刘胜,冯海波.税制结构与消费外溢:跨国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16(6):22-38.
- [17] 谢素华,黄鹂.浅析民营企业税负偏重的症因及解决措施[J].纳税,2017(24):12-13.
- [18] ACEMOGLU D. Equilibrium bias of technology [J]. Econometrica, 2007, 75(5): 1371-1409.
- [19] 龙少波,丁露,裴红霞.开放条件下中国式技术变迁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J].改革,2020(2):57-70.
- [20] 周晓波,陈璋.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下我国经济增长与不平衡结构的演变[J].改革,2019(10):57-65.
- [21] 张菡航.畅通双循环 现代流通体系加速构建[J].中国发展观察,2020(18):24-26.
- [22] 陈雨露.“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金融改革发展[J].中国金融,2020(Z1):19-21.
- [23] GEREFFI G.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apparel commodity chain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9, 48(1): 37-70.
- [24] POON S C. Beyond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 case of further upgrading of Taiwan'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 Glob-

- alisation, 2004, 1(1): 130-144.
- [25] KUZNETS S S. Modern economic growth: rate, structure, and spread[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6, 37(145): 475-476.
- [26] 江小涓, 李辉. 服务业与中国经济: 相关性和加快增长的潜力[J]. 经济研究, 2004(1): 4-15.
- [27] 丁守海, 丁洋, 吴迪. 中国就业矛盾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化研究[J]. 经济学家, 2018(12): 57-63.
- [28] 王雪琪, 赵彦云, 范超. 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影响因素及趋势研究[J]. 统计研究, 2016(2): 61-67.
- [29] 臧旭恒. 如何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8(2): 52-57.
- [30] REEVE T A. Factor endowments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6, 14(1): 30-53.
- [31] 张勋, 乔坤元. 中国区域间经济互动的来源: 知识溢出还是技术扩散[J]. 经济学(季刊), 2016(4): 1629-1652.
- [32] 刘志彪, 凌永辉. 中国经济: 从客场到主场的全球化发展新格局[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6): 1-9.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Double Upgrade" of Industries and Consumption to Smooth Economic Double Cycles

LONG Shao-bo ZHANG Meng-xue TIAN Hao

Abstract: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wi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ycles as the main body and mutual promotio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ycles" has become a strategic choice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blocking points in the key links of China's domestic economic cycle and the main aspects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ycle,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accelerated formation of the new pattern of China's Economic Double Cycles. The "Double Upgrade" of industry and consump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moothing the Economic Double Cycle. The "Double Upgrade" of industry and consumption through the three major mechanisms of "improvement of supply quality", "conversion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increasing and expanding employment" can effectively dredge major blockages in the key links of the domestic economic cycle,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effective government and the effective market to work together to smooth the domestic economic cycle. At the same time, the smooth flow of the domestic economic cycle will help to dredge the blocking points existing in the important aspects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ycle, which will enable China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operation with higher scale economic efficiency, industrial level and stronger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promote the domestic economic cycle, accelerate the mutual promotion of the two, and finally form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Economic Double Cycles.

Key words: double upgrade; double cycle; industrial upgrade; consumption upgrade

(责任编辑: 罗重谱)